

母亲与历史风云人物相遇的因缘

◆ 黎方夏

我的母亲吕迪华，湖南益阳人，1904 年出生于宦宦家庭。母亲姐弟五人，她虽排行老大，却被外公视为掌上明珠。母亲性格豁达开朗且言谈幽默，助人为乐。1921 年母亲和父亲黎叔平（曾任宋子文秘书）结婚，之后陆续生下了我们六个孩子。等我们稍稍长大母亲便参加工作，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海运管理局（原中国招商局）退休。

母亲就读于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时有幸认识了杨开慧、李淑一，其后一直和李淑一保持联系。我的外公吕慈尊（曾任湖南督军署秘书长等职）与谭延闿为世交，两人曾共事廿年。外公在事业上辅佐谭延闿，生活中也情如手足。吕、谭两家随着公务变动而辗转南北。谭公在广州孙中山大本营任秘书长时，外公随行，母亲也因此有机会在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见过毛泽东、李富春和蔡畅等人。谭延闿是民国元老又是著名书法家。因与谭家特殊关系，母亲获得谭氏所写完整的大字帖《麻姑仙坛记》。作为一个极其普通的职业妇女，却与好几位历史人物相遇相交，又得到一件珍贵的礼物——书法作品，即便有家庭和偶然的因素，却也不得不说是一生中难得的机缘。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见到毛泽东

谭延闿从政以来始终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徘徊，1922 年正值三次督湘后无所事事寓居沪上。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事件离开广州去了上海。他得知孙大总统驾到便亲自到码头迎接。两人在上海数周内“过从几无虚日”，常谈到深夜，加深了彼此了解。此后谭氏开始认识到“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谭延闿从此立志追随孙中山，并变卖家产支援孙氏以表决心。1923 年孙中山任命谭公为大本营大元帅府秘书长，之后又任北伐湘军总司令等要职。外公则从未离谭公左右，辅车相依。于是谭公和外公全家此时迁至广州。母亲也就跟着来到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一直到 1926 年。这年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举办最

后一届学习班之时。讲习所由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安排每一届主讲人。这一届学习班主任及主讲正好是毛泽东。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作为国民党党员的外公以旁听生身份去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同时也带着好学的母亲一起去。因此母亲也就有机会能近距离见到一袭青布长衫，一口湖南乡音的青年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虽初露头角，还没有成为名声显赫的风云人物。此前母亲已知道毛泽东是校友杨开慧的丈夫，因而倒有些像熟人相遇的感觉。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关系比较微妙，虽各有自己革命主张，却都在孙中山名义下进行革命工作，有时甚至“不以主义分左右，而因乡音常聚首”。李富春、蔡畅就经常是外公家的座上客。李富春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蔡畅则是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两位湖南老乡和外公谈得非常投机。母亲就读于长沙周南小学时，蔡畅曾任该校体育教员，因此母亲在旁也时时和蔡畅老师说上几句，并对他们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患感到钦佩。

在福湘女子中学与杨开慧相遇

母亲是在念中学时认识杨开慧的。外公是位开明的旧知识分子，曾赴日本进行考察，回国后便把子女送进教会学校。母亲就读福湘女子中学时结识了杨开慧、李淑一和蒋英。杨开慧是 1920 年进入福湘补习班。她们都是寄宿生，晚饭后大家会在操场上散散步，杨开慧便利用这种机会经常向同学们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大家感到很新鲜，觉得杨开慧懂得很多外面的事，同学们都非常佩服她。李淑一与杨开慧两家是世交，杨开慧还将柳直荀介绍给李淑一，最后成婚。蒋英更是和杨开慧一道向校方力争学生参加游行的权利。母亲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那些活动，毕业后却和李淑一、蒋英一直保持联系。蒋英后来成为一名医生

与邬达克同时代

王唯铭

14.沿江：外滩 27 号中傲慢的大班们

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方商号，也即后来的洋行在中国出现的最早年代，但早在 1759 年，当天朝帝国在乾隆帝的掌控之下，似乎还相当生气勃勃的时候，“散商”（主要来自英国）已经出现在了广州。

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科学校的威廉·渣甸，1802 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但显然，他的兴趣在于东印度公司“凡公司职员，每人每次容许夹带私货两箱”的优待章程而不是医生的天职，渣甸每次夹带的两箱私货可以想见多半为鸦片。很快，欲壑难填的他便于 1817 年脱离东印度公司，以散商名义进行鸦片走私。

完全可以说，19 世纪的怡和洋行属于人类世界的另一种，而 19 世纪的渣甸们则属于人类世界中的另一类。他们的精神世界，与 16 世纪来到中国的利玛窦截然背反，站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高于一切的平台上，他们野心勃勃、狂妄至极，从自己狭小的岛国出发，在掠夺幅员辽阔的他者空间时，极其野蛮地无视他者生存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能够实现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便有人生最大的快感。以鸦片贸易为例，他们只是丧心病狂地追逐着利润的获得，而全然无视吸食鸦片后的中国人民会招致多大伤害，当鸦片的吞吐毒杀着中国人民的肉体并腐化着他们的精神时，渣甸们却没有丝毫良知上的不安，他们如同今天哥伦比亚的毒枭。

1839 年，天朝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穷凶极恶的威廉·渣甸在伦敦游说女王政府与天朝帝国开战，为了怡和洋行的巨大利润，他们完全不在乎使用野蛮的武力，他们早就嚷嚷了，“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

1843 年 11 月 17 日，随着上海的开埠，怡和洋行的大班们也随着巴富尔一同脚踏着



李家庄这片烂泥地。

1922 年将近年底，正是近代上海最美好的时节，由怡和洋行出资翻建的怡和洋行大楼便在那时伫立在了外滩 27 号的地块上。这时，外滩新月形的江堤边，上海总会早已傲然伫立，汇中饭店更是以其红与白相间的墙面吸引着几多上海男女的视线。

大楼的设计师是英国人思金生，很快地，在怡和洋行大楼之后，他又将以上海设计出四川路桥头边上的邮政大楼，以及后来被毁的第一次欧战纪念碑。大楼高达 5 层，体量称得上宏大，在占地面积为 2100 平方米的基础上建筑面积达到 14300 平方米。结构是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而整个建筑的风格，思金生是给它冠上了新古典主义。这种新古典主义表现为立面上严格地按照着古典式纵与横的三段式处理，在一、二层上，牵引视觉的是 9 个半圆罗马拱形门券、统长钢窗，整个墙面上有着粗糙的花岗石，气势相当雄浑；三至五层，它们的中部，耸立着 4 根粗壮无比的科林斯巨柱，有着格外壮美的审美；第三部分的屋顶檐口与女儿墙，则忠实地表达了整个建筑的古典风范。

2012 年 10 月 26 日，那是怡和洋行大楼建成后的 90 年，我带着多少有点紧张的心情而进入其间。底层，我在米白色的大理石地坪、泛着暗光的楼梯扶手以及墙壁间的陶立克柱子上，深切地感觉到了这幢楼房曾经有过的尊贵，也感觉到了当年怡和洋行大班们的那种睥睨一切的心情。一切都已经变化，而且是十分深刻的变化，当 90 年的时光穿越而过这幢楼房，当它的空间中，曾经活动过的洋行大班、日本政客以及上海外贸局干部这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多已随风而去，那么落成于 1922 年的大楼，哪些细节还依然故我？哪些又早已灰飞烟灭？当年的怡和洋行大楼如今叫作罗斯福会所，这便是最大的变化之一。也因此，这个宏伟的空间中充满了浓重的罗斯福家族痕迹：从外滩正门处拾阶而上，墙的一侧挂着一幅西奥多·罗斯福的全身肖像；一楼的庭院餐厅内，每张餐桌上的菜单都印着罗斯福家族的黑白照片；三楼私人会所的包间内也悬挂着两幅罗斯福总统的肖像。

33.特色酒店

下午，海潮与阳光两大集团的合作改造石库门区域合同签字暨元青花瓶转让与捐赠仪式，正式在华贵大酒店举行。参加仪式的有市政府办公厅、市建委、市旅游局、市文管会以及两个集团的领导，还有相关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新闻媒体也派记者参加。会议由周松明主持，两个集团的董事长相继发言，然后进行了签字，接着就是元青花瓶转让文件的交换和捐赠书的宣读，最后是市政府秘书长的讲话。会议在公正、透明、热烈的气氛中进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海潮集团通过一只瓷瓶的转让，得到了石库门区域改造的资金保证，这样就可以把原先预算的投入资金，转移到东部工程中去，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是绝妙的商业运作。阳光集团通过在石库门区改造的投入，既实现了一个民营企业回报社会的宏愿，又对国家文物的保护贡献了一份力量，对增强企业的软实力和知名度，起到了极大的广告效应。

那么周松明与乔雅呢，婚礼后第二天早上，两人就去周松明的姐姐夫家，主要是看望母亲，还有就是再与姐夫斟酌石库门改造的设计方案。周松明见到母亲后，就把几大盒营养品放在桌上，并关照说：“你年纪大了，给你带来的补品，要按时服用，免得我经常来提醒你。”

姐夫万随意招呼周松明进书房谈事，周松蓉与乔雅去母亲房里聊家常。走进书房，不等周松明坐定，万随意就爽快地说：“松明，最近我被‘石库门改造工程’缠绕了，夜里睡觉都不得安稳，要改造成世界级的特色酒店，看来投入财力后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辛苦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以你的想法为主导，肯定不会有问题。”

“这样的工程，我也是第一次接手……古建筑翻新，我有经验，可是石库门建筑改造，则刚刚开始探索。这样吧，你先听听我的具体方案……”万随意打开了图纸，他从整体方案谈起，分别对环境风貌、平面布局、地下土建、水电设施、建筑翻新与美化等方面进行阐述，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他认为：改造成世界

耐心的年轻人。在父母结婚时，他将自己临摹的第一百二十五通《麻姑仙坛记》的大字帖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们（顺便提一下，谭公还是父母的证婚人，其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婚事因宋母和宋子文的反对，谭延闿作为说客成了他们的介绍人）。

当年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见到两广总督谭钟麟五岁儿子谭延闿所写的大字时说：“三令郎，伟器也，颜体殆可扛鼎。”谭延闿果然被翁太师言中。今人评说书家谓“学颜体者尚少人能出谭公右者”。民国时两处重要书法——孙中山奉安纪念碑及黄埔军校校牌，均出自谭公手笔。他被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实至名归。一般人前求得谭氏墨迹寸缣尺纸，便引以为宝。因此谭公送母亲此帖应为民国以降罕见珍贵墨迹。此帖系用厚卡纸装裱成册，长宽足有尺半许，厚约三寸左右，外加精致绫锦套盒。父母得此贵重礼物并未将其束之高阁而独享，为让此帖发挥其社会作用，便将其付印出版。

然而这样一件几可传世的墨宝，其命运却并没有那么幸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母由于出身不好又有港台亲戚，因此受到冲击，“戴高帽”，大会、小会批斗，抄家更是免不了。红卫兵将父母家藏的所有外文书籍和大部分字画以及照片抄走，那册谭延闿书写的《麻姑仙坛记》字帖却暂时幸免于难。红卫兵抄家时的呵斥和污蔑使父母刻骨铭心，虽然庆幸这件心爱的结婚礼物尚未抄走，但又生怕红卫兵们再来一次回马枪，母亲在这种极端矛盾心情支配下便忍痛将这册珍贵墨宝撕成碎片，在晚间悄悄地扔进了垃圾箱。想着本应传世的一件大书家真迹就这样消逝人间，母亲随即又极其悔恨。虽说毁于这场浩劫中的有价值的文物不可胜数，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虽说万幸的是该帖总算还留下了影印本，但这种痛惜心情对父母来说终身也不可能抚平。

摘自 2013 年第 3 期《世纪》

级的特色酒店，必须在环境、布局和内部装修中融入超前的理念、加入现代的元素；保留的则是区域的氛围、建筑的形式和风格。他打算在石库门区域，建造现代化的地下自动通道，与原来酒店大楼相连，这样会给予宾客出入带来便利。他建议尽快同市政府联系，把区域外的街道恢复成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环境风貌，还要增添一些具有那个时代风格的酒吧、茶馆、书场、戏院等场所；沿街的石库门底层，

在不影响格调的前提下，破墙开设各种具有怀旧情调的商铺。他还强调了石库门内部要布设光纤数据线、每间客房都应具有独立卫生间、小面积的房间可改建成公用洗手间或设备间、部分的楼座要取消原来的厨房，还要增设中央空调、铺设排气、消防管道……

周松明被万随意的一套设想折服了，连连点头。“姐夫，你考虑得真是很全面、很仔细，谢谢你的用心。”随后他一琢磨，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考虑要把其中的一栋房改造成总统贵宾楼，要从安全角度考虑，这栋楼房同外界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万随意听了以后，思考一下回答：“这问题解决起来也不困难，一是进出通道可以单独设计，二是内部改造可以特别布局，问题是那栋房子的选择很重要，这需要你们拿主意了。”周松明也赞成他姐夫的想法，他很负责任地表态说：“这样吧，关于外围的改造，我请示集团后打报告给市政府……沿街底层房屋改作商用以及总统贵宾楼的选择，力争早日得到市政府领导的批准，其他方面的改造，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

婚后的宋春花面色红润，心情十分舒畅，她感到自己与梁斌的结合，是天缘的作合，是善心的回报。多年来她苦苦地等待，切切地寻觅，不就是为了找一个如意的丈夫。梁斌生于书香门第，现在是高级工程师，他知识渊博、专业精熟，文弱书卷气内，却有一种男人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刚性。两人一张一弛、一唱一和，真是不多见的绝配。最让她感到满意的是：在梁斌的言之有理的劝说下，他哥哥投出了“石库门区域改造方案”的赞成票，既坚持了优秀建筑的保护，又回报了周松明与乔雅对她不计前嫌的关心。

石库门酒店

范潮龙

